

第一辑

■ Papers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

主 编 杨 舒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

第一辑

主 编 杨 舒
编 委 苏新连 吴格非 章礼霞
刘韶方 蒋栋元 黄 莹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

第一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 第1辑/杨舒主编.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81107 - 919 - 7

I. 外… II. 杨… III. ① 外语—文化—文集② 外语教学—
文集 IV. H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5894 号

书 名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

主 编 杨 舒

责任编辑 万士才

责任校对 徐 玮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政编码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42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组织编辑的《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于我校外语及外语专业教育教学有益、于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益、于中国矿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校园文化内涵的提升有益的好事,值得庆贺。应编者之邀,发表点感想,以示祝贺与期待。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等学校中通常只有综合性大学、外语学院和师范学院开设外语专业,理工科高校一般是有公共外语教学而无外语专业。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理工科高校陆续办起了外语专业,其中发展较快的,已经成为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理工科高校外语专业的创办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我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的一种基本态势,体现为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大学的一种内在要求。

在理工科大学,外语专业是为数不多的人文学科专业之一。它十分重要,但通常又处于弱势。理工科大学之所以办文科,是因为在理论层面上人们已逐渐意识到大学的功能在于育人而非制器,大学在自身发展和育人过程中必须体现出应有的精神与文化价值追求,因而科技与人文的相互补充和协调发展对全球化背景下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及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一些理工科大学的外语教学及外语专业建设所具有的人文内涵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学科发展潜力亦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水平也有待提高。这种状况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难以细说。

显而易见,外语在理工科大学长期只是一门公共课。即使是今天,在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中,外语依然没有摆脱其只是作为科技人员的一种工具的地位。外语专业的地位不高、发展不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此。外语专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相关教育教学质量及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外语专业在学校办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影响力的扩大,重要的和首要的一条,就是主体思维方式的转换、价值目标的确立、自觉意识的增强。即无论是管理者、建设者、施教者,必须首先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外语单纯作为一种工具的思维定势;充分认清并彰显外语教学及外语专业自身的人文内涵、学科功能,明确改革、建

设和发展目标;把大力提高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水平作为外语教学与外语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并在实践中见诸自觉行动。只有这样,外语教学和外语专业才能在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强势环境中获得足够的认可和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也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

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威廉·冯·洪堡曾经说过,“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实际上表明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形式规定了思维的内容。马克思也指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它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是“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是其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最重要的载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是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对于一个人来说,语言是其实现文化身份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实际上可以看成一种文化传承、文化塑造和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具有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极为广阔的理论探索空间,可谓学无止境。

一位优秀的外语教师同时也应当是一位富有文化气象的学者,既要有扎实的中外文语言基本功、广博的中外语言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又要有对于语言教学的目标对象方法手段和规律、中西语言文化比较、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跨文化交流乃至外语学科的建设发展等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深入研究。简言之,最好是应当具有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文化学术造诣。所以,在外语教学和相关的专业建设实践中,应当做到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并重,大力彰显外语教学及外语专业的人文与学术内涵,围绕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开展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提升教学水平、充实教学内涵、促进学科建设。只有这样,外语教学才能既有效地传授语言知识技能,又超脱知识技能本身而成为融人文素质教育 and 交际能力培养为一体的育人或树人过程,并且能够创造和提供一种博雅的学术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学习者能充分获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心理、文化和学术品格,同时,还能够通过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推进和带动专业与学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认为,《外国语言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出版,正是体现了对于这样一种博雅的学术环境及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相互促进局面的追求。她的出版将为广大外语教师的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搭建一个新的平台,开拓一个新的空间。

邹放鸣

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2008年4月

目 录

序.....	邹放鸣(1)
--------	--------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詹姆斯·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	吴格非(3)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码转换与身份冲突解析.....	杨 舒 马淑云(8)
论伊迪丝·华顿作品中的消费文化表现	王丽明(15)
超越“快乐”的“忧郁” ——《忧郁颂》中的矛盾悖论与哲学思想研究	李淑玲(23)
解析东西方对待慈善事业的不同态度	杨 静 章礼霞(28)
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	翟石磊(32)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寻常事物的艺术美	李少华(38)
《老人与海》的绿色思忖 ——浅析《老人与海》的回归主题	赵 君(44)
美国梦追寻中的美国身份解读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文化解读	崔 化 苗 媛(48)
《红字》中的罪与赎	朱倩倩 刘 丰(54)
《红字》男女主人公的宗教精神解构	王新东 康 杰(60)

外国语言研究

工科研究生英语学术语篇的交互性特征	黄 莹 徐 雯(67)
英语语用容忍度启动条件分析	高 翔(75)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位论文中转述语篇调查研究	单旭光(80)
英汉双语中夸张与低调的语用功能对比研究	祖大庆(86)
从中英情景喜剧看幽默的语用分析 ——从《老友记》和《武林外传》谈起	夏 雪 王会娟(94)
语法隐喻在科技语篇中的体现	袁晓雯 李文梅(99)
自我实现需要与广告语言的幽默.....	吴 昊 刘韶方(103)
用评价理论解读有关动物的英语谚语.....	王 翠 刘韶方(107)

非对称语码的跨文化研究·····	朱海燕(114)
论德语同形异义词·····	魏琦(121)

翻译研究

权力话语理论对翻译的影响·····	文涛(129)
英语广告中模糊词汇的语用功能及翻译方法探讨·····	关家玲(133)
赏析《论语》英译本中“仁”的翻译·····	刘会民(139)
结合许渊冲的《声声慢》译本谈中国诗词可译性的实现·····	白玉红 王会娟(143)
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谈翻译对等·····	刘维奇(148)
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庞德的诗歌翻译·····	宁淑梅 温力亚(154)
从文化角度看《红楼梦》中的习语翻译·····	李春艳 吕胜建 李蓓(159)
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看英文字幕的汉译·····	张凤 王会娟(165)
浅谈《水浒传》中冒语的分类及其翻译·····	吕胜建 李蓓 李春艳(170)
归化与异化之争	
——评《飘》的两个译本·····	李蓓 吕胜建(176)
从目的论看商标翻译·····	赵婷婷(183)
英语科技语体中模糊限制语的运用及翻译·····	王芳 刘丰(190)
从译介学角度看鲁迅的异化翻译·····	李丽伟 吕淑文(195)

外语教学与研究

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王克强(203)
大学英语报刊阅读课中的媒介类型及惯例教学·····	赵虹(210)
词块理论对学习者语言输出能力培养的启示·····	李灏(217)
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的大学英语词汇教学·····	沈丛 朱哲(223)
运用积极词汇教学策略 促进消极词汇向积极词汇转化·····	仲佳(227)
多媒体与大学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交互式研究·····	朱哲 董永生 沈丛(232)
身份认同研究与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李玉影 杨舒 沈丛(237)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吴艳(243)
英语专业《圣经故事》课程教学刍议·····	吕芳慧 吕海峰(247)
后摄自主学习与英语教学·····	郑秀梅 刘韶芳(252)
口译教学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	王会娟(259)
德国外语教学方法的发展与变化·····	张树萍(263)
谈德语翻译课程设计的新理念·····	万云慧(269)
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吕淑文(274)
论语言测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功能和应用·····	丰峰(277)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詹姆斯·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翻译与传播

吴格非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19 世纪苏格兰人詹姆斯·理雅各在华担任传教士期间, 致力于中国古典经书的研究与翻译, 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英国读者从理雅各翻译中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后来的欧美汉学家往往从他的翻译中汲取营养, 获得启发。以他的成就, 称之为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并不为过。

关键词 理雅各; 中国经典; 中英文化交流

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苏格兰人, 19 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士。他热爱中国, 在中国担任传教士期间, 曾游历大江南北, 同时刻苦学习中文, 博览中国古典文学与经学著作。所有这一切, 为他深入了解中国、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奠定了深厚基础。他曾前后耗时 20 年, 在中国助手王韬的配合下完成了中国十三经的翻译工作, 赢得了世界声誉。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汉学家看来, 这些译著的翻译质量水平在欧美迄今无人超越。

1843 年, 詹姆斯·理雅各受伦敦传教士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 来到当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创办英华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并担任院长。这是一所教会学校, 其初始目的是培训中文传教士, 但由于这方面工作进展得不太成功, 他后来转向英文教育, 英国文学理所当然成为其中重要课程之一。1845 年, 理雅各回到英格兰。在英格兰期间, 他不断反思在香港的工作生活经历, 总结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终于到 1848 年他重返香港时, 对如何在中国做一名传教士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到: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崇拜学术成就……在那里, 学术受到高度尊重。”^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人民来说, 他们的风俗习惯、行为举止的形成, 都能够追溯到他们远古时代的典籍经书, 因此, “要了解中国, 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文学”^②。于是他下定决心, 要努力学习汉语, 熟读中国古典经书, 最终把它们翻译成英语并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推广中国思想。在他看来, 这是一名称职的在华传教士的分内之事。为学习中文, 理雅各多次去广州购买书籍, 并且游历了中原与华北等中国广大地区。在山东, 他还拜谒了孔子的陵墓, 希望这位中国古代贤哲能给他带来中国文化的智慧和启迪。从 1858 年开始, 理雅各正式着

①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 Cultural Studies*, Tokyo, 1963, P23.

②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29.

手翻译《四书》《五经》。1861年,他先完成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的翻译工作。他把《四书》分为两卷出版,分别叫做《中国经典》卷一和卷二。“这是中国的《四书》首次以英文形式出现”,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① 1865年,他又翻译完成了《史记》和《春秋》。定名为《中国经典》卷三。此后至1871年,他陆续翻译了《左传》、《易经》、《礼记》、《书经》和《孝经》。1886年,他在英国翻译出版了《道德经》和庄子的《秋水篇》。除了翻译中国经典,他还出版了许多介绍中国经典的英文著作,如《孔子的生平与教诲》(*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 1867)、《孟子的生平与教诲》(*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 1875)。1880年,他应邀在伦敦的长老会学院(Presbyterian College)做了题为《中国的宗教——对基督教、儒教和道教的客观公正的讨论》(“Religions of China—A fair and Dispassionate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Christianity, Confucians, and Taoism”)的讲演。

理雅各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过程,是极其漫长而艰辛的。说其漫长,是因为他的翻译活动历时近20载,即使在卸任回国后亦笔耕不辍;道其艰辛,是由于他是本着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去研究翻译这些典籍的,他曾遍览汉代以来学者们对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在全面梳理和评价他们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见解,然后进行阐释和翻译。关于理雅各的翻译成就,他的助手、当时香港地区著名中国文化传播专家王韬有过非常翔实的评价。他指出,在理雅各之前和同时代来中国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出版了很多书籍,他们都致力于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而“理雅各是唯一不畏艰难开展对中国十三经研究的人。他带着批评眼光阅读文本,追本求源,形成了关于这些经典不同寻常的独到见解……他把十三经全部翻译成了英文。这些译著刚一问世,便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他们由衷地赞叹其中复杂而精细的解释,并纷纷把这些译著当做研究中国经典著作的指南”^②。著名中国文学翻译家、汉学家盖尔斯(Lionel Giles)也曾指出,詹姆斯·理雅各的不朽译作使得英国读者在后来的50年里能够阅读到儒家经典。

理雅各通过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使他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个性心理,并在中西视野共同观照下对特定问题作出独特解释。他也很善于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在结合起来思考,让人看到中国理想神话和现实情景往往并不相符。譬如,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屈原时说:“中国人普遍有这样一种情绪,即中国的高级官员一旦在斗争中遭遇失败或者被君主贬职,那么他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国人的这种情感,即使不和屈原之死有因果关系,起码也可以把后者作为一个典型例证。”^③但现实往往出乎老百姓的这种情感想象。他谈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占领香港时,一名中国绅士对他保证说,“香港陷落了,但总督叶铭琛决不会被活着抓住的,你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当理雅各告诉他,总督已经被俘虏,而且就关押在英国军舰上时,

^①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27.

^②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29.

^③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31.

结果这位绅士变得非常沮丧和羞愧。中国文化培养了对官员的敬畏和景仰之情,他们在百姓心目中往往是英雄式人物。一旦他们遭受屈辱却不选择自杀时,他们在百姓中的形象便轰然倒塌。

理雅各在英国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首先可以从他的亲朋好友对他的评价中看到。譬如他侄子说:“由于对为人类服务充满热情,他努力使自己融入亚洲的思想和情感中。他打开了了解中国思想的大门。他所做的完全是拓荒式的工作,因为他属于最早一批承认中国文学地位并认为必须使它被基督教世界充分了解的人。”^①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雅各的文章《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之关系》中。在文章中,他把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价值观和基督教圣经进行对比。他说:“基督教道德的至高境界出现于公元五六世纪,而那时候正是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发生接触的时代,当时我们的社会还不发达。”^②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正不可阻挡地走向世俗化,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阐释它们的真理和要旨,使人们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把握二者所拥有的共同真理,因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它们都是既非无神论,也非泛神论者。

不少英国读者从理雅各翻译中理解了中国科举制度。譬如当时有一篇评论指出:“在广袤的中国文学中,有九部作品尤为重要……它们的影响至今仍然无可估量。对这些古代经典之作的理解主宰着中国最高级别的教育。掌握这些经典意味着读书人有可能做到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而不读这些经典,则可能连最卑微的官职也捞不到。”^③理雅各去世后,他的一位牧师朋友 DR EDKINS 在布道中说:“他历经磨难完成的翻译篇章包含了大量重要事实,它们成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正确判断中国问题的依据,因为其中的箴言在中国大受欢迎,其思想统治了学者及所有人的心灵……这些经典将永远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④

后来的欧美汉学家往往从他的翻译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理雅各之后,也有很多人翻译中国经典,他们都模仿和参考过理雅各的译文风格和内容。理雅各的译文以直译为主,但辅以大量的注释。这一风格,后来为几乎所有的英国汉学翻译家所采用。譬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一名叫列奥那多·列奥(Leonard A Lyall)的英国学者翻译了《孟子》、《论语》和《中庸》。他在《孟子》译文的前言中坦承:“我尽量采取逐字逐句的直译方法从中文译成英文。这并不总行得通。在无法达意的情况下,我采取直译加注释……我充分参考了理雅各的《孟子》译文。”^⑤

理雅各本人也曾谈到他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他不断提到工作的艰苦以及所产生的价值。他说:“我是以一名称职的中国学者的精神去翻译这些中

①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29.

②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37.

③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32.

④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38~P39.

⑤ Lyall, Leonard A. *Trans. Menciu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2, v.

国经典的,为此我付出了25年多的艰苦劳动。这项工作是值得的,它使世界其他地方得以了解这个伟大帝国。”^①他还从朋友那里不断得知他的翻译作品被接受的情况。他在信中写到:“日本政府订购了10套我翻译的中国经典,这是哈里·帕克博士写信告诉我的,他还告知我,日本政府准备请我担任一所学院的院长,只要我同意,即刻可以成行……查尔姆先生写信给我,说‘我越来越相信你所从事的工作对传教士们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中国经典当做基督教天平的一个支撑点……我要给牧师协会的条例中在增加一条,即在中国如果一名外国牧师要就某些专题进行布道的话,他必须首先努力了解中国的诗人和哲学家在这个领域说了些什么,或者有哪些影响’。”^②

王韬是理雅各的助手。众所周知,西方著名的宗教文学经典《圣经》于1819年被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从英文翻译成中文,^③这个译本曾被认为“文笔优美,颇得中国古文之韵味”^④。但鲜为人知的是,对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进行润色的,是一位名叫王韬的中国籍中外文化传播专家。他曾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翻译、促进中英文化交流方面作出过独特贡献。其成就包括协助詹姆斯·理雅各翻译了《尚书》、《颂》、《春秋》、《左传》和《史记》。王韬熟读经书,曾撰写24卷的《中国经典著作理解注释》(Notes on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s)、30卷的《诗经全解》(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Books of Odes)、60卷的《春秋左传详解》(Explanations of the Chun Chiu and Tso Chuan from All Sources)和《礼记全解》(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这些著作帮助詹姆斯深刻领悟中国经典的内涵。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借助王韬著作中的解释作为理解原文的依据”^⑤。他曾写到:“只有一流的本土学者能对我的工作提供帮助,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王韬博士。”^⑥1867年,理雅各回英格兰后,他写信邀请王韬到英国,继续协助他翻译中国经典。王韬应邀到英国两年,协助理雅各翻译了《诗经》、《易经》和《礼记》。在英国期间,王韬曾在牛津大学发表关儒家思想教育的演讲,理雅各做他的翻译。“听众被他的演说所感动,给予他长时间的掌声。”^⑦在他回国之时,他向牛津大学图书馆捐赠了11 000卷图书,这是他从中国带到英国的。其目的是促进中国学说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1897年,理雅各在牛津大学去世,但他作为欧美汉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已经奠定。1928年,国际东方学研讨会在牛津大学举行,来自美国的欧洲各国的学者拜谒了他的

①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40.

②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43.

③ 详情见潘玉田、陈永刚著《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④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 Cultural Studies*, Tokyo, 1963, P43.

⑤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 Cultural Studies*, Tokyo, 1963, P46.

⑥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43.

⑦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65, P55.

陵墓并敬献花圈。以他的成就,称之为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并不为过。

James Legge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lassics

Wu Gef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UMT,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James Legge is a 19th century Scottish missionary in China. While staying in China, he dedicated himself in studying and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His translations not only enabled British readers to obtain a good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but inspir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sinologists in the later days. Therefore it is appropriate to regard him as the first monumental person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Legge; Chinese Classics;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码转换与身份冲突解析

杨 舒 马淑云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 在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笔下, 她们的女主角, 都是用两种语言讲话, 生活在双重文化困扰中。一方面, 她们要努力承传移民父母的语言与文化; 另一方面, 她们生活的社会要求她们讲“标准”英语, 按照主流社会的规范行事, 要像中产阶级那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当代走红华裔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 尝试分析不同的语言对她们的生活和作品产生的影响, 解析语言与身份意识的互文关系, 从而揭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人形象及其变迁。

关键词 华裔作家; 语码转换; 身份冲突; 多元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条件”或“背景”, 人类所有文化活动都是在语言提供的平台与基础上展开的, 都是受到语言制约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文本再现。文学的本质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但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通过语言的折射获得的, 因此, 人与现实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与语言的关系, 文学的写实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实现的。

由于语言与生活形式的这种内在联系, 对语言的使用要求每个人必须融入到一定的文化世界。华裔美国女作家们是怎样通过语码转换在文化夹缝中确立她们的文学地位的呢? 她们的作品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和生活形式被广为接受的? 不同的语言在她们的生活和作品中起的什么作用? 她们是怎样通过语言来斡旋自己的多重身份的? 本文将通过分析美国当代走红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的作品尝试分析这些问题。

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形成的美国华裔文学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 是东西方文化杂交的产物, 因而美国华裔文学既要放在美国语境中又要放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研究。美国语境中的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已日趋深化,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中国视角和中国观点的缺乏使得中国语境中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一、海外华裔的生存现状

在分析海外美籍华裔文学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之前, 有必要了解一下现实生活中新老移民的生活历程, 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依附与背叛并存的关系。移民家庭深刻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两代人对主流社会的认识和融入其中的条件及社会现实的约束影响的, 由此而引起对社会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及人生观认识的差异。

毋庸置疑, 早期的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 第一代移民大多数把美国当做创业、淘金的乐土。美国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漫长的人生旅程的一个

驿站,因此从心理上他们还奉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价值观念。融入主流社会并未成为他们人生的一大目标。同时,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大都不能自如地参与社会竞争和交流,也成为早期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早期移民更愿意与家人和本族人度过大部分时间,较多地使用汉语而不是英语,怕蹩脚的英语给自己丢面子。因此,第一代华人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大都在华人社区中寻找生活空间。

而移民后代的经历要复杂得多。随着美国社会排华情绪的缓解,在美国本土生活长大的华裔后代有机会走出华人社区的封闭圈子,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够在主流社会中寻找发展机会。当他们走出家庭文化的围城,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发展自我的时候,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必然发生,甚至产生对家庭的反叛。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道:“直到今天仍不能忘记,儿时用晾衣夹夹住自己的鼻子,希望把它变成西方人的高鼻梁。有段时间,我甚至着迷用塑胶整形手术幻想改变自己的外貌。”华人后裔的这种反叛,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原因外,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这种文化观念冲突问题如此普遍,对华人生活的影响如此重要,它成为许多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主题,也是我们解读华裔美国文学必须思考的问题。母女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由发生、发展到走向缓和,是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有的作品借助两代冲突表现第二代人摆脱传统枷锁束缚,获得自我意识及自我实现及由此导致的全面美化的思想倾向。

华裔美国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确立了自己独立的流派地位。这种新兴的文学流派,特别是华裔美国妇女文学的兴起,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和身份感。虽然华裔作家的作品都以不同层次和程度描写中国文化,但在文本中大量使用中国文化符码,并获得成功的作家当属汤亭亭和谭恩美。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为人们研究语言、人物、思想、文化及民族、性别身份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二、华裔作家作品中的语码转换与身份冲突

在华裔美国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她们的女主角,都是用两种语言讲话,生活在双重文化困扰中:一方面,她们要努力与移民父母保持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她们生活的社会要求她们讲“标准”英语,还要像其他中产阶级那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都描述了移民母亲们过去的忍辱负重及现在的狂燥烦闷。这些描述有力地展示了她们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自我身份感,同时也让人们正视了双重文化身份和崇尚社会“一体化”意识的强烈冲突。

谭恩美在《母语》(Mother Tongue)一文中曾提到她一直酷爱语言,庆幸自己生活在“不同的英语环境中”(谭恩美,1991:196)。她从母亲那听到的英语尽管“不地道”,但它却是“伴我成长的、代表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特殊语言”。这与学校教的“标准”英语在语法上和文化上都有不符,只是一种“简单的”、“夹杂母语的”语言。(ibid:191-201)但正是这种特殊的语言,让她领悟到双重文化的魅力,领悟到母亲的语言所凝聚的美和智慧:“她的语言是那么地生动、直接,充满了洞察力和想象力”(ibid:198)。汤亭亭也生活在这样的

双语环境中,《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描述的就是她在两种语言之间辗转的经历。母亲告诉她,她是听着许多不知名的中国女性的故事长大的。汤亭亭记述了自己的体验:“为了让我的生活美国化,我把这些都付之梦中,让它们永远都无法在头脑中复生”(汤亭亭:102)。这本书记叙了汤亭亭对自己美籍华人身份的困惑以及她为接受充满神奇故事的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

谭恩美的《喜福会》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洛杉矶,作者采用分段记述的方法,分别描述了四位移民母亲以及她们美籍女儿的故事。小说开始就是一位留美妇女与天鹅的故事,她说:“到了美国,我要生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但在那儿,我不会让任何人瞧不起她,我要教她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将生活富足,无忧无虑。她会明白我的用心的……”(谭恩美,1989,P17)。这个故事不仅象征着地理上的远离祖国,而且象征着后来的母女隔阂。母亲希望女儿讲地道的美式英语,正是这样的愿望使得母女在用不同的语言交流时,难以相互理解,母亲的美国梦最后破灭:掌握了地道的英语,不但没让女儿取得美式的“成功”,相反,却预示了与母亲及母语文化的疏远,加深了母女间的代沟和文化分歧。此外,地道的美式英语还隐含着在种族和性别掩盖下的“异文化”过程。

作者曾在书中庆幸自己生长在两种语言环境下,因为双重语言和文化实际上丰富和启发了她的人生。但是,双重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个性斗争的感情创伤。在《喜福会》中,华裔母女们的谈话大多都在争辩、谈判和对两种不同文化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母亲也同意女儿对于双面人的看法:“我一直在琢磨我的两面性、我的倾向,哪面是美国的,哪面又是中国的,哪一面更好?要想成为其一,那就得舍弃另一面。”(谭恩美:266)在文章《语言的智慧》(The Language of Discretion, 1990)中,谭恩美说,两种语言密不可分的感觉使得我们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语言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想法。“这样把语言和行为一分为二的做法是危险的。哪些是中式、美式的……都不可取。”“听惯了英语和汉语的混合,我对任何英汉语言比较都感到怀疑,特别是那些把比较者本人的语言当做是标准,当成参照物来寻求逻辑性解释的对比。”

讲某种语言本身就是有社会文化色彩的。作为华裔妇女,她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中,不得不随时改变自己的文化和角色以适应社会需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的语言价值是不可能平等的。谭恩美曾幽默地指出她的母亲讲的英语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她却从来也没有在任何正式语言测试中取得高分。这里,不容置疑的原因就是在日常交流和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用某一标准来衡量另一种文化,而其主流“标准”都是欧美的思想和鉴别方式。

语言和身份在美国社会结构中是有等级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华裔从来都没有得到与欧洲裔对手同等的地位。一方面她们坚信自己“汲取了两种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她们不得不面对多重语言与身份的矛盾斗争。双重文化身份并不简单意味着两种中立的、原始的语言范畴,两种文化的介入必然产生人格、社会关系甚至是政治上的影响。在充满种族、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华裔妇女为争取自己的地位进行不懈的奋斗,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冲突是难以想象的。

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地道的英语”曾是母亲天真的“美国梦”,后来却破灭了女儿的“双重文化幻想”。就像女儿June抱怨的那样:“这些说法让我觉得母亲和我讲的完全